

唐文治 著

四書大義

【上】



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

唐文治 著

四書大義

上



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
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四書大義 / 唐文治著. --上海: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313-14116-3

I. ①四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儒家 IV. ①B222.1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268328號

四書大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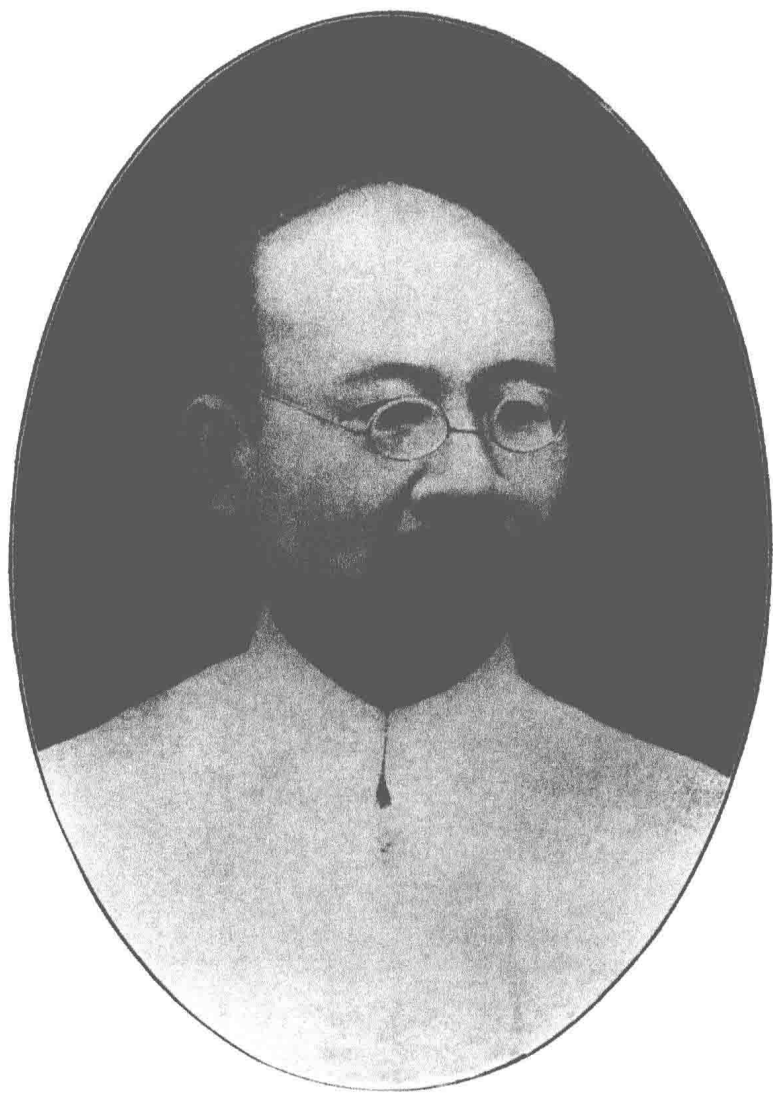
著 者: 唐文治	地 址: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
出版發行: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	電 話: 021-64071208
郵政編碼: 200030	
出 版 人: 韓建民	
印 製: 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	經 銷: 全國新華書店
開 本: 710×1000毫米 1/16	總 印 張: 130.25
總 字 數: 590千字	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	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書 號: ISBN 978-7-313-14116-3/B	
總 定 價 (上、下冊): 798.00圓	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

告讀者: 如發現本書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刷廠質量科聯繫
聯繫電話: 0769-85252189

紀念唐文治校長誕辰一百五十週年

上海交通大學經學文獻研究中心編



唐文治(1865-1954)

攝於1912年，時任南洋大學校長



唐文治銅像

攝於上海交通大學閔行校區文治大道

出版說明

唐文治，字穎侯，號蔚芝，別號茹經。江蘇太倉人。生於一八六五年，卒於一九五四年。清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進士。先生早年受家庭嚴格教育，十四歲前通讀四書五經。十七歲師從鄉前輩理學家、古文辭家王祖畚。二十一歲入江陰南菁書院，受業於經學大師黃以周，兼採漢宋，深造有得。二十八歲中進士，先後在戶部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、商部、農工商部等任職。兩次出國考察，深諳國內外形勢，多次提出興利除弊、挽救國家危亡之策略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〇年出長上海交通大學，廣攬名師，博採衆長，整頓舊局，創立工科，以培養品學兼優的第一等人才為職志，制訂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奠定了交通大學工學基礎和發展方向。一九二〇年以後執掌無錫國學專修館，前後三十餘年，培養出一大批文史研究和國學教育等領域中的優秀人才，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國學大家。

唐文治先生宗仰程朱理學，以修齊治平作為立身處世之目標。藉儒家經典闡發微言大義，寄託自己的懷抱和理想，以期拯救人心，治安社會，為後世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。他是近現代少數兼具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教育家和國學大師。值此先生誕辰

一百五十週年之際，亦將迎來上海交通大學建校一百二十週年之慶典，特此出版其《論語大義》《大學大義》《中庸大義》和《孟子大義》四種著作，作為紀念。

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

唐文治《論語大義》探微

虞萬里

一、引言

同治四年（一八六五），蔚芝先生生於太倉鎮洋縣岳王市陸宅之靜觀堂，祖父唐學韓爲取名文治，字穎侯。後字新民，號蔚芝、儒極，別號茹經。太倉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文化底蘊深厚，唐家本衛所軍戶，高祖時已入學籍，故先生六歲即從外叔祖讀《孝經》，七歲讀《論語》，八歲讀《孟子》，以啓其蒙；九歲始讀《詩經》，至十三歲而讀畢五經。年十四，爲業師王祖畬所器，十五中秀才，十七入王門受業，埋首性理之學，研探作文之法。自後分日讀《朱子小學》《近思錄》《性理精義》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》等。同年七月，鄉試中第二十名舉人。研讀《二程遺書》《朱子文集》，兼覽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爾雅》，不廢經學。自六歲至二十歲，先生讀書之外，心無旁騖，十餘年中，已築成經學、小學與理學之根基。

光緒十一年（一八八五），赴南菁書院應試，以超等成績入書院肄業，受學於經學大師黃以周，並爲黃視作「高第弟子」，與吳縣曹元弼、江陰章際治、陽湖趙椿年、武進劉翰、常熟孫雄等結爲至交。其時黃以周《禮書通故》成，先生與陳慶年、孫雄等任參

訂；王先謙輯刻《皇清經解續編》，復與同學任校閱。在研習性理、參訂校閱經學名著之際，得讀漢學家惠棟、張惠言、焦循等《易》學著作，始鑽研《易》學。黃以周乃漢宋兼采之經師，見其習《易》，謂清代易學未能有貫通漢宋自成一家者，教以讀《通志堂經解》中著作。先生乃研讀朱震、項安世、吳澄之《易》著，冀作《周易集解疏》而未果，然已成《易》義論說近十篇，此後數十年，始終對《周易》保持研究熱忱，七十歲時出版《周易消息大義》，即植基於此。

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）成進士，分派戶部江西司主事，歷任農工商部侍郎並署理尚書，十餘年間，興利除弊，挽頹振靡，不遺餘力，踐履儒者經世致用之宏願。一九〇六年，出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，從此獻身教育。上任伊始，即調整科目，延聘名師，制定規章，培育英才，短短數年，已奠定交大工科發展方向。一九二〇年校長任上去職，退居無錫，創辦國學專修學校，用另一種教育方式，培育出一大批第一流國學人才。上海交大與無錫國專，本是兩種完全不同性質之學校，而蔚芝先生先後執掌兩校，能夠同收碩果。溯其因果，除儒者夕惕若厲，至誠踐履而外，更有孔孟弘道育人、程朱格物致知爲其動因。而此種弘道精神與思想內涵，更體現在其《論語大義》《孟子大義》及其諸多大義著作和相關篇章中。

二、「大義」書名溯源

蔚芝先生著書多以「大義」名，除《論語大義》外，有《周易消息大義》《周易九卦大

義《尚書大義》《洪範大義》《詩經大義》《禮記大義》《大學大義》《中庸大義》《孝經大義》《論語大義外篇》《孟子大義》《二程子大義》《洛學傳授大義》《周子大義》《張子大義》《朱子大義》《二程子大義》以下五種合爲《性理學大義》《國文大義》《國文陰陽剛柔大義》《國文經緯貫通大義》《古人論文大義》《政治學大義》《論語救國大義》第一節——學等二十餘種，足見「大義」一詞是其一生著作之中心詞。一般認爲，「大義」猶言「講義」，學校講稿，可稱「講義」，亦可稱「大義」。然先生於其他講稿，不少亦標作「講義」，^{〔一〕}如《高等學堂道德講義》《高等國文講義》，更有單篇單刊時作《孟子不忍人章講義》《詩小雅常棣篇講義》《詩小雅蓼莪篇講義》《孝經開宗明義章講義》，刊於《大衆雜誌》上皆標《孝經講義》（一）（二）至（十二）等，而最後寫定成著後，卻一律標作「大義」，此當別有懷抱與寓意。

「大義」首見於《子夏易傳》與《六韜》，義爲正道、大道理。《莊子·秋水》：「萬物一齊，孰短孰長，道無終始，物有死生，不恃其成，一虛一滿，不位乎其形。年不可舉，時不可止，消息盈虛，終則有始。是所以語大義之方，論萬物之理也。」諸家雖多以「大

〔一〕 蔚芝先生於《論語講義式》云：「『講義』昉於宋代，朱子《玉山講義》、陸子《白鹿洞講義》是也。近代著名者，陸清獻公《松陽講義》爲最。今則法式蕩然。」《唐蔚芝先生演講錄》第六集上卷，交通大學出版處一九四二年，第一四七頁。

道」解釋「大義」，^{〔一〕}然此詞未嘗不可作為前文描述宇宙萬物終始盈虛之簡要概括，故已蘊含「道要」之義。漢立五經博士，以傳記遞相授受，宣元之際，章句之學盛行，一經說至數十上百萬言，學者皓首窮經，苦其繁瑣，於是有置其瑣碎，獨探經典要義之人。《漢書·翟方進傳》謂其「又受《春秋》，通大義」，後劉歆又「略從咸（尹咸）及丞相翟方進受，質問大義」。班固伯祖班伯先從鄭寬中、張禹受《尚書》《論語》之「大義」；班固亦「所學無常師，不為章句，舉大義而已」。漢光武帝在天鳳中「之長安受《尚書》，略通大義」，桓譚「善鼓琴，博學多通，徧習五經，皆訓詁大義，不為章句」。「大義」與「章句」相對，是為簡略要義之意。凡此兩漢君臣，皆不願窮治章句，而僅領略經典要義，以經世濟民。漢代經師著作無以「大義」名者，僅劉向有《五經要義》，義或近之。漢魏之際，學者仍力圖擺脫繁瑣考證，故有以「說要」名書者，^{〔二〕}即述說大義、要義之謂。晉代

〔一〕 參見褚伯秀《莊子義海纂微》卷五十三，華東師大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，第五四七—五五〇頁。鍾泰云：「曰『大義』，猶曰大理大道也。」《莊子發微》卷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，第三七七頁。

〔二〕 《隋志》有《春秋說要》十卷，魏樂平太守糜信撰，《釋文敘錄》謂其東海人，字南山。姚振宗謂乃糜竺、糜芳之同族，見《三國藝文志》，《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》第九冊，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，第一二七頁。

尚清通簡約，始以「旨」、「旨通」、「要略」、「要記」名書，^{〔一〕}意皆論述一書之要旨。歷兩漢而魏晉，由繁瑣而返簡約，其論著雖不以「大義」名，而君王、名臣固多鄙薄章句，競尚經典要義以濟世。

南北朝講疏、義疏之學興盛，分疏義理，剖發精奧，識記成書，篇幅繁重。讀之即使可瞭無餘義，研習卻不免費時延日，驟然披尋，難得要旨，遂有「大義」之作。梁武帝雄才博學，既有諸多「講疏」、「義疏」之作，又撮其要旨爲「大義」多種，如《周易大義》《尚書大義》《毛詩大義》《禮記大義》。^{〔二〕}就某種角度論，六朝之「大義」著作，係針對豐富之義疏而將經典要旨作簡要概括而另行，目的是使學者能便捷掌握經旨諦義。「大義」因「義疏」之繁重而產生，有明顯的實用意義。

清代乾嘉崇尚樸學，考證經義，不避繁瑣，儒家經典，多有新疏，然皆崇尚漢學，篇帙浩繁。道咸以還，今文經學崛起，漢宋兼採呼聲隨之。蔚芝先生少從王祖畬受性理之學，復入南菁書院從黃以周受訓詁義理合一之學。雖不廢考據，而處風雨雞鳴之

〔一〕《晉書·李充傳》載充有《周易旨》六篇，《通志藝文略》有李顥《周易卦象數旨》六卷，《隋志》有王述之《春秋旨通》十卷，《兩唐志》有李顥《尚書要略》二卷，環濟《喪服要略》一卷，《七錄》載劉逵《喪服要記》二卷，賀循《喪服要記》十卷。

〔二〕牟潤孫謂梁武帝「《尚書大義》《毛詩大義》《禮記大義》疑即三書講疏之約本」。見《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》，《注史齋叢稿》，中華書局二〇〇九年版，第一三九頁。

世，慨然以拯救人心、圖強中國爲己任。他曾大聲疾呼欲以人道、人倫、人格、人心救國，「舍孔孟之學而無他塗，故其一生於《論》《孟》兩書用力最深。既欲以《論》《孟》救世，使世人有理可依，有路可循，必將其精義揭櫫方可。且清末民初政局鼎革，中西文化激盪，新舊思想衝突，廢經倒孔，精神失所依憑，道德一墮千丈，又一次重演「夫子殛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卒而大義乖」新局。此時要想揭示孔孟思想旨要，必須直截了當，不汲汲於辨析細微末節之是非，無容作繁瑣異同之考證。於是遙承漢儒經世思想，將自己一系列經學著作徑直標舉「大義」一名，自有其深遠之學術歷史意義與深切之社會現實意義。處此蝸蟬沸羹、神州晦暝之際，「大義」一詞，既有直抉奧義、標舉簡約之意，復寓醒世驚心、凜然不拔之志。其苦心孤詣、意匠獨運，不可不先表揭於此，俾供讀先生之書者體味。

三、《論語大義》成書過程

蔚芝先生七歲讀《論語》，二十歲前埋首性理之學，於二程與朱子及陽明等書爛熟於胸。可以說，他是真正汲取了傳統儒家文化精華作爲正能量，落實到自己的立身處世之中，故其出處語默，體現出儒家修齊治平與經世濟民水乳交融之人格。然至光緒

〔二〕參唐文治《廢孔爲亡國之兆論》，《茹經堂文集三編》卷一，《民國叢書》第五編，第九十五冊，第一頁。

末年，西風勁燭，社會風氣急轉，「唯恐經書一日不廢」呼聲漸高。晚清政府對此深表憂慮，下令「中小學堂宜重讀經，以存聖教」。此後讀經廢經，反覆無常，民國肇建，明令初等小學廢止讀經。時先生正在郵傳部上海實業學堂任上，將實業學堂改名南洋大學堂，忙於學校之建制調整和經費之申請落實。偶因經費問題赴京與交通部總長面商，見「京師氣象，腐敗已極」。^{〔一〕}回滬之後，有友人來告，謂「近今學校，罷去讀經，如向者戶誦之《論語》亦無人復讀，而朱注尤苦精深，益加節錄，以便初學乎」。友人以將此事屬之先生，是以前於《論語》一書獨有心得之故。先生當時無意之中「漫應之」，繼而思之，雖節錄朱注，未免舛陋，然在廢經不讀之社會中畢竟可以啓蒙傳道，於是節取朱注，並附自己所撰《大義》二十篇。此書名《論語》新讀本」，^{〔二〕}係作爲「國學啓蒙之一」的讀物，然雖云啓蒙讀物，卻是有爲爲之，其自序云：

世界何爲而險巇丕塞至於此極乎？人心何爲而欺詐迷繆至於此極乎？四書五經束之高閣而不屑讀，舊道德掃除殆盡，而於新道德亦茫乎無所知，爲人之道

〔一〕 唐文治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》，《近代史史料叢刊》第三編，第九〇冊，第六七頁。

〔二〕 按，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編》將此事繫於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記云：「冬，編『論語大義』成。採用朱注，別下己意爲小注，取簡單以便初學。又探先聖經義作大義二十篇（此後刪改數次乃成定本）。」《近代史史料叢刊》第三編，第九〇冊，第六九頁。

當如何，鮮有能道之者，此淘汰道德之過也。」^{〔一〕}

讀此可見先生所以著此讀本，主要是廢經之後，舊道德被破壞而新道德未能建立，世人立身處世，失所依憑，導致人心欺詐迷繆，社會誠信蕩然。作為經理學陶冶鑄鑄之著者，面對江河日下之清季世局，認為「天下之存亡，實士大夫心之存亡爲之，亦即士大夫氣之存亡爲之也」，^{〔二〕}堅信《論語》實有可以致太平者，自會以孔孟精神所支撐、驅使，挺身擔當道義，故《新讀本》之撰作，確有挽救人心，恢復道德，維繫社會的涵義。《讀本》正文大字，注文雙行小字，天頭標注難字直音和聲調，其形式脫胎於清代四書五經讀本。每篇後所附之《大義》，卻是蔚芝先生「貫串群言，發明道要」之心得。至於其注釋，大多是取朱熹《論語集注》而「刪其繁複，補以古注」，「參以鄙意」的地方不多。此爲作者有關《論語》之第一本著作，先由門人沈炳燾在長沙排印，復有上海徐家匯工業專門學校鉛印本，其讀者應是上海交大前身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之學生。

一九二〇年，蔚芝先生應施肇曾之請，出長無錫國學專修館，先仍以此讀本教授甲乙班諸生，既而「深病其略，爰復下己意加以潤色」，是爲修訂本，其讀者是無錫國專

〔一〕 唐文治《論語新讀本序》，按，「國學啓蒙」本出版年月不詳，另有上海徐家匯工業專門學校鉛印本，爲一九一五年出版。

〔二〕 唐文治《重印文文山先生集序》，《茹經堂文集》初編卷四，第一五頁a。按此文作於一九〇九年，適值民元前夜。